

#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薛海波

(徐州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关键词]南匈奴内迁; 东汉; 北边; 边患; 西羌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2)03-0065-06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数万部众主动归附东汉,随即被东汉安置在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等北边八郡<sup>①</sup>。上述地域是两汉防御匈奴南下的最主要防线。因此,内迁后的南匈奴直接关系着东汉北边边防的安危。学界通常认为,南匈奴内迁起到了帮助东汉抵御北匈奴南下侵掠、弥补东汉北边兵力不足、巩固东汉北边边防的作用。如果将南匈奴内迁置于东汉北边边防形势演变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检索《后汉书》关于南匈奴内迁后对北边形势的记载不难发现,南匈奴内迁既没有改变北匈奴频繁南侵的态势,也没有在东汉后期抵御鲜卑南侵的战事中发挥多大作用。反之,由于南匈奴内迁后的叛服无常,却成为影响东汉北边边防安全的一大边患。

## 一、南匈奴内迁与东汉朝廷的处置措施

据《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匈奴右翼

鞬日逐王比由于在匈奴统治集团争夺单于位的斗争中失败,加之“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于建武二十四年以“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的堂皇说辞,款五原塞归降东汉。《后汉书》卷19《耿弇传附耿国传》载:“(耿)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促成东汉迅速作出关乎整个北边安危重大决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南匈奴的乞怜和为东汉守边的说辞,而是东汉建武时北边严峻的军事形势。

匈奴趁西汉末年中原战乱之机,扶植汉人卢芳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sup>[1][卷12《卢芳传》]</sup>。在卢芳的配合下,匈奴连年侵掠东汉北边。而此时东汉朝廷正忙于削平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无暇顾及北边,连年战乱也使其无力经营北边。因此,东汉朝廷只能采取内徙边民的

[收稿日期]2011-12-20

[作者简介]薛海波,男,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① 大致相当于从今河北省西北怀来县起,经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陕西省沿长城内外各县直到甘肃省陇东。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上海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第37页。

收缩政策。建武九年(公元33年)徙雁门吏人于太原。建武十年(公元34年)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关、居庸关以东。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sup>[1]</sup>《卷1下《光武帝纪下》卷18《吴汉传》》,但这种向内收缩却加剧了匈奴南侵的范围和频率。《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载:“(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扶风、天水距东汉都城洛阳的直线距离约为400公里、715公里<sup>①</sup>,骑马仅需2.7天、4.7天就可以到达。可见,匈奴已对刚建立的东汉受权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北边八郡的人口数分别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4.13%、5.74%、9.92%、15.25%、8.32%、84.85%、45.27%、43.48%<sup>[2]</sup>《P.70》。所以,东汉初年在刚刚经历西汉末年的战乱和内迁后,北边八郡的人口数量则远远少于永和五年。因此,在东汉初年,人口极少的北边八郡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组成强大的边郡部队抵御匈奴,而仅靠临时性的派驻少量朝廷军驻守当地又远远不够。所以,南匈奴之所以能够顺利内迁,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汉北边兵力的严重不足。南匈奴单于率部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长城塞内的自然资源、生活物资和借助东汉的力量与北匈奴抗衡,而东汉朝廷接受南匈奴的内迁则是要南匈奴“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两者目的并不一致。这就决定了内迁后的南匈奴是否能够替东汉“捍御北虏”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其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相对于西汉宣帝与呼韩邪单于订立的羁縻关系而言,为将内迁的南匈奴“改造”成一支完全受东汉朝廷控制、听从调遣、捍卫北边的军事力量,东汉将与南匈奴的关系确立为严格的君臣关系。《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南匈奴单于要定期纳贡、送侍子入朝为质、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不仅如此,东汉朝廷虽不干涉南匈奴单于位的传承,但南匈奴单于位却要经过东汉朝廷的封授,颁发印信,才算最终取得。而据《汉书》卷94下《匈奴传》记载,西汉确立的与呼韩邪单于之间的稳定的羁縻关系是以一个比较完整的北边边防体系、驻扎大批边军和每年向匈奴输送大量的粮食、金钱、

布匹和丝绸等经济物资为支撑的。以此推论,东汉要确立和维系对南匈奴的君臣关系,就必须有比西汉宣帝时更为强大的边防力量和更多的财力。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东汉将南匈奴单于庭设在西河郡美稷县,其他诸部如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sup>[1]</sup>《卷89《南匈奴传》》。《后汉书》载“建武二十二年,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由此可知,此时东汉在北边八郡几乎没有戍守的边军和防御工程,根本谈不上控制分布在近千公里边防线上的数万南匈奴部众。为牵制内迁的南匈奴,东汉于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将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内迁的数万边民迁还本土,又派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sup>[1]</sup>《卷1下《光武帝纪下》》。对于八郡边民而言,重新迁回北边形同投身死地。为此,东汉朝廷规定所经诸县赐边民以装钱,转输给食<sup>[1]</sup>《卷1下《光武帝纪下》》。明帝时规定迁居中原的北边民遣返时,一人赐2万装钱。依此计算,仅在建武十五年内迁的雁门、代郡、上谷三郡6万人边民所赐的装钱就需要12亿钱<sup>[3]</sup>。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民户4270634,人口31007820人。以一家5口,一夫妇3子为标准计算,“该年东汉的算赋为 $2/5 \times 31007820 \times 120$ 钱=1488375360钱,口赋为 $3/5 \times 31007820 \times 23$ 钱=427907916钱,更赋为 $1/5 \times 31007820 \times 300$ 钱=1860469200钱,三项常赋总收入为3776752476亿钱”<sup>[4]</sup>《PP.332~337》,而所要遣返的北边八郡边民的人口数要远超过6万人。因此,东汉朝廷所赐的装钱应超过东汉全年3项常赋总额的32.4%,而转输给食、修缮城郭的费用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可想而知,建武二十六年的徙民充实北边之举严重消耗了东汉的财力。基于此,以后东汉再也没有实施过如此大规模的徙民实边活动。那么,建武二十六年花费了巨额财政的大徙民是否收到了增加北边八郡人口,牵制南匈奴的政治目的呢?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编户汉民共75963户,479893人。而据《后汉书》卷89

① 本文所涉及的具体地理距离的测定主要参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

《南匈奴传》记载,在永元二年(公元91年)南匈奴由建武二十六年的四五万人迅速增至237300人。从建武二十六年之后至永和五年,东汉先后诣北边八郡降服的北匈奴至少239000人,两者共计476300人。由此可知,北边八郡的匈奴人口与当地的汉人大体相当,也有可能多于汉人。出于保持南匈奴骑兵战斗力及便于管理的考虑,东汉朝廷保持了其部落组织。因此,虽然北边八郡的汉人与匈奴人数量相差无几,但汉人分散的五口小农之家显然无法牵制聚族而居、具有较强攻击力的南匈奴部落。

那么,北边八郡汉人是否能够为北边防御提供经济和兵源上的支持呢?南匈奴内迁后,依旧保持着其游牧的生活方式。游牧经济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在同样面积土地上,从事游牧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到从事农耕养活人口的1/10<sup>[5]</sup>。因此,与汉人人口相近的匈奴人需要的牧场要远远多于汉人。内迁的匈奴人必然借助其部落组织,不断夺取、蚕食汉族小农的土地。加之沉重的赋役,生活在北边八郡的汉人只好破产流亡。为此,东汉朝廷只好不断地赈贷汉族边民。永元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00~102年),东汉先后赈贷五原、朔方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sup>[1]《卷4《和帝纪》》</sup>。永初元年至二年(公元107~108年),东汉朝廷则将赈贷扩大至包括北边八郡大部在内的并州和凉州<sup>[1]《卷5《安帝纪》》</sup>。然而,单纯的赈贷根本无法缓解边民的生活困境,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sup>[1]《卷5《安帝纪》》</sup>。在边役、饥荒、破产重压下的汉族边民根本无心戍守边郡。《后汉书》卷4《安帝纪》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由此可见,至东汉后期,东汉初年的徙民戍边牵制南匈奴的措施基本上失去了作用。

建武二十六年,东汉朝廷在南单于庭所在地西河郡美稷县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又“置安集掾吏,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sup>[1]《卷89《南匈奴传》》</sup>,以此监护南匈奴单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为防止南匈奴单于与北匈奴交通叛乱,又在距离西河郡美稷县西北37公里的五原郡曼柏县设置度辽将军,领度辽

营、黎阳虎牙营及朔方、五原等郡边县屯兵<sup>[6]</sup>。其中,黎阳营是骑兵一千人<sup>[1]《卷89《南匈奴传》注引《汉官仪》》</sup>。朔方、五原屯兵大多是永平八年至九年(公元65~66年)徙边的刑徒<sup>[1]《卷2《明帝纪》》</sup>。而东汉前期每年徙边的刑徒人数在1万人以上<sup>[3]</sup>,所以朔方、五原两郡边县的屯兵可能在2万人之上。因此,度辽将军所领的兵力应为2万数千。加上护匈奴中郎将、西河长史所领的兵力,东汉在南单于庭及其周边部署的直辖兵力可能在2.5万上下。如果按照每户1人服兵役计算,北边八郡最多可以编练郡兵75963人。据《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永元二年(公元91年),南匈奴各部总共胜兵者为50170人。由此可知,东汉在北边八郡的兵力近10万人,是南匈奴的2倍,表面上可以震慑住南匈奴。然而,南匈奴大多均为骑兵,而东汉军队大多为步兵,机动和战斗力远逊于南匈奴,而且由于东汉军队大多无心戍边及缺乏训练和战力的边民组成的边郡兵占大多数。可知,虽然南匈奴兵少,但实际上南匈奴要强于东汉部署在北边八郡的军事力量。因此,一旦东汉北边军事形势出现重大变动或者国内其他地区爆发动乱,就难保南匈奴不同机而动。

东汉北边八郡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南匈奴内迁后仍然以游牧经济为主业。游牧经济不能够生产足量的粮食、铁器、盐等生活必需品,离不开贸易、掠夺、狩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而贸易关系是建立在游牧经济一方稳定的“盈余”之上。然而,对于南匈奴而言,一次狂风、一场暴风雪、一股寒流霜降和持续的干旱都有可能使羊、马等牲畜损失惨重,通常南匈奴自己都很难估计自己能够有多少可以与汉人交换的“盈余”<sup>[7]《P.10,12》</sup>。因此,要获得粮食、盐、铁器等生活必需品,只能掠夺汉人或发动大规模的武力入侵。为了防止出现上述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东汉每年要输给南匈奴大量的资财,用于填补南匈奴的经济缺口,至永元三年(公元92年)达到一亿九十余万钱。而同时期东汉经营西域的财政开支为七千四百八十万<sup>[1]《卷45《袁安传》》</sup>,仅此就令东汉不堪重负,朝野要求放弃西域的呼声不断。

## 二、内迁后的南匈奴与东汉北边边患

受南匈奴内迁的影响,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侵扰东汉北边的鲜卑、乌桓先后通使归附东汉。据《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此时北匈奴

奴也频频向东汉请求和亲、朝贡、互市,以求不用武力达到获得所需生产、生活物资的目的。东汉考虑到如果与北匈奴改善关系,“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sup>〔1〕</sup>《卷89《南匈奴传》》。因此,东汉虽然没有断绝与北匈奴的联系,但在战略上却只能对北匈奴采取敌对政策。由于东汉暂时没有力量消灭北匈奴,这就使东汉北边仍然面临着北匈奴南下侵掠的威胁。

那么,南匈奴是否能够替东汉抗击北匈奴的进攻呢?永平五年(公元62年)十一月,北匈奴六千骑由五原入塞,十二月东进至云中,直至原阳县,行程一百八十五公里,停留至少近三十天<sup>〔1〕</sup>《卷89《南匈奴传》》。《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仅记载了南匈奴在西河长史马襄的救援下,在原阳将北匈奴赶出塞外,却没有记载战果如何。五原、云中两郡都有南匈奴部落,在两地之间骑马动员诸部与北匈奴作战仅需1~2天的时间。而北匈奴却可以在塞内休整数十天。因此,这次战事实质上应该是南匈奴在北匈奴入寇五原后,采取了保存实力的策略,并没有征调部落阻击北匈奴,使饱掠之后的北匈奴得以从容撤退,从而使南匈奴和汉军毫无战果。永平七年(公元64年),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永平八年(公元65年),北匈奴“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sup>〔1〕</sup>《卷89《南匈奴传》》由此可知,南匈奴承担不起抵御北匈奴的重任。相反,东汉抗击北匈奴寇边的主要力量仍是边郡兵。如“其年(公元73年),北匈奴入云中,遂至渔阳,太守廉范击却之。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无所得。”<sup>〔1〕</sup>《卷89《南匈奴传》》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南匈奴单于上书东汉朝廷,主动要求率骑兵3万讨伐北匈奴,但声称需要东汉出兵并担任主攻。“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sup>〔1〕</sup>《卷89《南匈奴传》》此时,北匈奴在鲜卑的打击下已国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sup>〔1〕</sup>《卷89《南匈奴传》》。加上蝗灾的袭击,北匈奴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南匈奴单于在北匈奴如此孱弱、又拥有3万骑兵的前提下,仍请求以东汉边军为主力。其原因在于南匈奴单于希望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前提下,获得消灭北匈奴最大的政治利益,带有

极强的政治投机性。总之,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至多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

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军队击溃北匈奴并迫使其西迁后,鲜卑族入主匈奴故地,兼并北匈奴残众十余万落,“称兵十万,才力劲健……兵利马疾,过于匈奴”<sup>〔1〕</sup>《卷90《乌桓鲜卑列传》》,成为比北匈奴还难对付的新的边患。由于东汉官吏镇抚失当,与北边安危息息相关的凉州西羌部落先后在永初元年(公元114年)至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至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暴动,“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sup>〔1〕</sup>《卷87《西羌传》》,遍及西北,延至关东。羌乱不仅使并、凉两州“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骸,死生涂炭”,也使东汉军队“兵连师老,不暂宁息”<sup>〔1〕</sup>《卷87《西羌传》》。东汉为镇压西羌暴动所投入的军费、转运委输等费用在360亿钱之上,而东汉桓帝时一年的租税收入仅为60亿钱,这使东汉“府帑空竭”。此时,北方地震、洪旱等大规模灾害频发,以至京师洛阳都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这些因素使东汉在北边仍然存在巨大边患的形势下,无力再向北边驻屯重兵,已无大量的财物再与鲜卑及乌桓互市。

就分布在北边的南匈奴而言,在消灭北匈奴的战争中“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sup>〔1〕</sup>《卷89《南匈奴传》》,与建武时内附的四五部众相比,南匈奴实力大增。根据王明珂的研究“游牧民族要靠不停的移动来寻找变化无常的水、草资源,及时逃避各种风险,因此各个小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都需拥有行动的‘决策权’。这使游牧社会的各层次社会认同与人群亲缘关系也经常‘移动’。这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权威上。”<sup>〔7〕</sup>《P.26》这在南匈奴单于与南匈奴各部的关系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内附的南部五骨都侯2万多人叛归北庭,几乎占南匈奴人口的一半。又如,东汉灵帝诏发南匈奴出兵配合东汉幽州刺史讨伐鲜卑,“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公元188年),右部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

于”<sup>〔1〕</sup>《卷89《南匈奴传》》。那么,南匈奴单于就更没有办法统领其所收纳的、与其有长期战争仇恨的数万北匈奴降众了,由此,北匈奴降众不断在塞内掀起暴乱。据《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永元六年(公元94年)在多次讨伐北匈奴的左谷蠡王师子被东汉朝廷立为南匈奴单于后,“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破之。于是新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叛,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这次逢侯领导的北匈奴降众叛乱直到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才被镇压下去,叛乱延续了13年,遍及东汉北边各地。此后,北匈奴降众经常反叛,成为东汉后期北边的边患之一。

与反叛出塞转而以入塞侵掠为目的的北匈奴降户相比,由于南匈奴对于东汉还存有一定的经济依赖,对于东汉在北边的军力也有所顾忌,与鲜卑在牧场等经济资源上还有争夺,因此,南匈奴仍然站在东汉一边。据《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载:“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秋,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六年(公元119年)秋,鲜卑入马城(代郡)塞……建光元年秋(公元121年),辽西鲜卑大人其至鞬复叛,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冬,复寇雁门、定襄,遂攻太原……二年(公元123年)冬,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五原),薁鞬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三年(公元124年)秋,复寇高柳(代郡),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由此可见,鲜卑连年入塞侵掠的地点不仅遍及南匈奴部落所属的代郡、上谷、云中、五原、雁门、定襄等东汉北边边郡,而且深入到北方的战略要地太原。抗击鲜卑入塞的主要是东汉的边郡兵,南匈奴非但没有任何战果,反而一败涂地。《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载:“永建元年,即公元126年)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

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又据《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统计,从鲜卑占据北匈奴故地至东汉灵帝光和中期近90年间,鲜卑入寇东汉北边18次,南匈奴仅跟随东汉边军抗击鲜卑5次。由此可见,南匈奴根本无力抵御鲜卑对其部落的侵掠,其自身尚离不开东汉边军的保护,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分布在东汉北边一线的南匈奴来讲,它是鲜卑入塞寇边首要的侵掠对象。鲜卑入寇的次数越多,南匈奴的损失就越大。而此时东汉的国力基本都消耗在西北羌乱上,对鲜卑频繁入侵只能疲于应付,无法向南匈奴提供足够的军事保护,无力继续向其提供充足的物资。因此,南匈奴在与东汉共同抵御鲜卑的同时,出于维持自身经济的需求,经常趁东汉内地动荡或北边军力削弱的时机起兵反叛。《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载“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檀)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叛,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四年春,檀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种击破之。”南匈奴单于庭美稷县距离常山约905公里,常山到中山约120公里,南匈奴单于叛军深入关东1000余公里。以掠夺粮食等物资为目的的南匈奴骑兵,无疑会将沿途数十万关东饥民推向绝境。据《后汉书》卷47《梁懂传》及唐朝李贤注记载,东汉镇压叛乱所调遣的军队,既有驻扎在京师洛阳的中央军羽林五校营士,又有北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辽西、右北平十郡兵2万余人,还有辽东太守耿种率将鲜卑部众。从调遣兵力的范围上看,几乎囊括了东汉在北边能够调动的所有军力。由此可见,自从西羌暴动后,处于北边塞内的南匈奴一旦发动叛乱,就会危及东汉北边的安全。

由于南匈奴北接鲜卑、东邻乌桓、西临羌胡,因此在东汉后期,南匈奴为了对付东汉北边边军,还经常联合鲜卑、乌桓、羌胡一同发动叛乱。如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杀郡长吏。”<sup>〔1〕</sup>《卷90《乌桓鲜卑列传》》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西羌攻金城、大寇关中,东汉集中10万大军屯驻汉阳。南匈奴句龙吾斯等趁机“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

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1]《卷89《南匈奴传》》。史实表明,南匈奴此次大叛乱不仅沉重打击了东汉北边边军,沿边诸州也深受其害。东汉的北边防线遭受重创,不得不向南、向东收缩,西河郡治由平定县南徙至210公里的离石县,上郡治由肤施县南徙至约300公里关中的夏阳县,朔方郡则东徙到175公里的五原郡。而迁徙郡治则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原地的边防工事,其郡所辖的编户也就变成了田宅尽失的流民。因此,与北匈奴降户、南匈奴部落单独叛乱相比,南匈奴联合其周边的乌桓、羌胡发动的暴动规模大、范围广、破坏力强,给东汉整个北边边防乃至北方的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就东汉而言,此时已经没有能力在西北和北边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还需要南匈奴为其提供兵源。因此,对于南匈奴叛乱,东汉经常是招抚或者以镇压促其归降了事。这就使南匈奴保存了伺机暴动的实力。由于南匈奴部落遍及东汉北边,东汉后期的军力和财力渐趋枯竭,加之南匈奴、羌胡、鲜卑、乌桓都有入塞、进入内地抢夺生产、生活物资的共同需要,因此,东汉后期,南匈奴与西北的羌胡、北边的鲜卑、东北的乌桓等北方胡族入塞侵掠或发动暴乱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战略上相互呼应、战术上相互配合的默契关系,从而对东汉北边和北方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如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1]《卷89《南匈奴传》》。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南单于诸部并叛,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1]《卷89《南匈奴传》》。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鲜卑)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1]《卷65《张奂传》》。这些都是明显的联合侵扰和武装侵掠。由上所论,在北匈奴被击溃后,特别是西羌暴动后,南匈奴虽然为东汉守卫北边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兵源,并没有与东汉彻底决裂,但其频繁发动的叛乱却给以东汉北边边防军及边防体系以沉重打击,从而成为东汉后期鲜卑、乌桓能够轻易频繁入塞侵掠的重要原因。而北边军事形势的严峻,又迫使东汉经常从西北战场调兵平叛,进而成为西羌暴动久讨不平的原因之一。因

此,东汉后期,特别是西羌暴动后,内迁的南匈奴本身就是影响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稳定的巨大隐患。

综上所述,南匈奴内迁主要是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为东汉守卫北边并不是其主要目的。东汉为将南匈奴变成完全受其控制调遣的军事力量,采取了大规模的徙民实边、派驻了大量军队、每年向南匈奴输送大量资财等措施,由于以上措施要消耗大量的资财,从而大大加重了东汉朝廷和民众的经济负担。但从实际效果看,东汉不仅难以维系与南匈奴的关系,而且也使东汉无法真正控制南匈奴各部。南匈奴虽然时常派兵协助东汉抗击北匈奴,但其以保存实力为主,并没有承担起替东汉守卫北边的重任。西羌暴动后,由于东汉将军力、财力主要用于西北平羌,无力继续经营北边。缺乏东汉武力牵制、经济供给的南匈奴,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与东汉共守北边的同时,不仅自身经常发动叛乱,而且还与北边的鲜卑、乌桓、西北的羌胡遥相呼应,联合内寇,给东汉北边边防以沉重打击,使北方内地深受其害,也使东汉军队在西北和北边两个战场疲于奔命,成为羌乱久讨不平的原因。因此,南匈奴内迁后并没有在东汉解决北边边患的战争中发挥多大作用,而且,东汉后期,南匈奴本身就是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 [参考文献]

- [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 廖伯源. 论汉代徙置边疆民族于塞内之政策[A]. “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3] 邢义田. 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刑徒[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86(第57本·第2分册).
- [4] 黄今言. 秦汉军事史论[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5] 王利华.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J]. 历史研究, 2001(4).
- [6] 廖伯源. 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0(第60本·第1分册).
- [7] 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何天明)